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英】庄士敦 著 潘崇 崔萌 译 李宪堂 审校

儒学与近代中国

CONFUCIANISM AND
MODERN CHINA

【英】庄士敦 著 潘崇 崔萌 译
李宪堂 审校

儒学与近代中国

CONFUCIANISM AND
MODERN CHINA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儒学与近代中国 / (英) 庄士敦 (Johnston, R. F.)
著; 潘崇, 崔萌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201-06796-4

I. ①儒… II. ①庄… ②潘… ③崔… III. ①儒家—
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5876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5.875 印张 2 插页

字数: 180 千字 印数: 1-4,000

定 价: 28.00 元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 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 桦

邹爱莲 孟 超 徐兆仁

戴 逸

编译丛刊编委会

主编 于 沛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美】孔飞力 王大庆 王 江

王晓秋 【法】巴斯蒂夫人

【德】达素彬 【俄】米亚斯尼科夫

朱政惠 刘 东 张西平

【英】吴芳思 杨念群 赵世瑜

耿 昇 徐 浩 徐思彦 钱乘旦

虞和平 戴 寅

CONFUCIANISM AND MODERN CHINA

THE LEWIS FRY MEMORIAL
LECTURES

1933-34

Delivered at Bristol University

by

REGINALD F. JOHNSTON

K.C.M.G., C.B.E., M.A. (Oxon); Hon. LL.D.,

Professor of Chinese in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the Far East
in the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4 Henrietta Street Covent Garden

1934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 世纪、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

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

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年5月

前 言

结集出版的这些演讲是我于 1933 年 11 月至 12 月间在布里斯托尔大学所作。在此,我诚挚地感谢布里斯托尔大学,使我得以有机会给布里斯托尔的听众就中国儒学的当前状况与前景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我也感谢我的老朋友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副校长托马斯博士,我在访问这座城市和布里斯托尔大学时受到了他热情的礼遇。

庄士敦
伦敦大学东方学院

目 录

前言/1

第一章 导言/1

第二章 十四个儒学文本/4

第三章 孝道/30

第四章 老师与学生/35

第五章 祖先崇拜/41

第六章 儒学与政治忠诚/50

第七章 儒学是否是宗教/59

第八章 儒学体系中的音乐和仪式/81

第九章 儒学在古代和现代的命运/97

第十章 儒学与 1911 年的革命/110

第十一章 儒学与共和政体/120

第十二章 儒学与未来的中国/138

中英文名词对照/160

译后记/173

插图目录

1. 曲阜孔庙的庭院	第 20 页
2. 曲阜孔庙大成殿的大理石柱子和栏杆	第 45 页
3. 曲阜孔庙大成殿的天花板	第 65 页
4. 曲阜孔庙大成殿孔子像	第 90 页
5. 孔子墓地	第 106 页
6. 山东邹县孟子墓地	第 131 页
7. 王道宣言	第 151 页

第一章

导 言

在我开始向你们就“儒学与近代中国”这一话题作演讲之前，要作一个声明：对于一个演讲者来说，他非常希望听众跟着自己的思路走，但是由于我强烈地意识到我所选择的话题充满着争议，我不得不严肃地提醒你们，不要过于想当然地接受我所阐述的内容。或许这样的声明不但在你们看来显得唐突，而且在别人的演讲中也从未有过。不论你们怎么看待这个提醒——这几乎等于承认我没有资格站在这个讲台上向你们作演讲——但它至少说明我不是一个政客。对所犯的错误承担责任，对这点我有充分的认识。

同时，我也必须提醒你们，如果这是一所中国大学而不是英国大学的话，在我第一个字出口之前，我面对的可能早已是一片抗议的风潮了。仅仅是演讲的题目本身即足以激起许多听众的对立情绪。可能有人会对我说，儒学不论在过去的中国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在今天这个人们都在朝前看的中国，儒学的重要性已经丧失；而对于中国的明天而言，儒学则更是毫无价值，不值得传承。可能还会有人对我说，将“儒学”和“近代中国”联系起来既是对儒学的不尊重，也是对近代中国的凌辱。

上述观点我都难以认同。但是，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已为那些目前在中国学术圈中有支配性影响的人士所接受。而正是这

些观点,导致儒学今日在教育体系中的衰微。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思想及人格正通过这一教育体系来重塑。

在这一系列演讲中,我将尽力去证明自己的看法,并解释其立论基础。我坚信,儒学至今仍然是存在于中国民众之中的富有生命力的一股力量,并且展示了对中国的今天和未来的巨大价值。

有人曾提醒我,在我谈这个题目的时候,不要想当然地以为听众们对儒学的基本常识都已有所了解。同时,他还提醒我,即使是一个布里斯托尔的听众,可能也会希望我解答一下类似“儒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

我之所以说“即使是布里斯托尔的听众”,是因为我把布里斯托尔看成是一个“富于冒险精神的商业之城”——我是在最积极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汇的。布里斯托尔是一个不只以贸易和商业为标志的、具有世界性视野的城市,一个不只致力于追求物质财富、更致力于探求精神财富的城市。如果这一界定对于过去数世纪的布里斯托尔来说是相符的,那么这一界定对于当今居于英国数个繁荣的学术生活中心之列的布里斯托尔,就更为名副其实了。

如果非要我解答“儒学是什么”的话,由于我对布里斯托尔的听众满怀敬意,所以我很难给出一个既简洁又内涵丰富的答案。我可以给出一个组合性的并且内涵丰富又简洁的定义,即使我们可以小心翼翼地对它加以剖析,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儒学的精髓可能就会流失掉了。

我不希望你们满足于西方研究儒学的那些东方学家们所作的任何定义,不论他们的定义是多么的精妙。如果以下观点是正确的,即如人们告诉我们的那样,只有基督教徒才能理解并解释基督教,那么当然,以下结论也是不错的,即只有一个儒学的信徒才能了解并解释儒家学说。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如果不是许多研习中国问题的学生们似乎都忽视了这一点的话。正如我们不能通过在教堂外的驻足观看来欣赏教堂窗户的美一样,如果想对儒

学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我们必须努力从它的内部观察它,并且尽可能地靠近儒家学说的忠诚守卫者们的观点。^①

除了把发生于二十五年前的一段小插曲讲给你们听外,我想不出一个更好的方法去靠近儒家学说的观点。正是这段小插曲,让一位学者精心挑选出了儒家伦理学说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理念,并且逐个加上他自己的评论,编纂成册。这位作者过去是,现在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儒家学者之一。由于自身渊博的学识,更由于其良好的品性,他比其他任何我所知道的中国人都更有资格被称为“君子”——在儒家话语里相当于学者和绅士——这一令人尊敬的称号。

① 据报道,伦敦一个主教曾说:“我到过世界各地,并近距离观察过世界上其他的宗教。毫无疑问,这些宗教中都不存在能够照亮人们生活之路的烛光。”(参见 Fausset:《现代的序曲》,第 242 页。)

这位主教也许确实近距离观察过“其他的宗教”,但这并不等于说他曾从内部对它们进行过观察。而只有从内部观察这些宗教,他才有可能看得到他所宣称不存在的烛光,甚至是透过窗子倾泻而入的阳光。无论如何,让我们认同那些基督教作家们的观点吧,因为他们坚持认为除了基督徒外,没有人可以真正理解基督教的真义。然而,在这里有理由提醒他们的是,当探讨非基督教的教义体系时,他们就变成了外行人。伯格森曾不无益地提醒我们,要达到“智识上的同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直觉,是非常困难的。他说:“人的思想,必须要痛苦地转变已经习惯了思维方式,必须对已有的观念进行不断的修正,甚至是重塑。”在同一作品中的其他地方,他告诉我说:“人可以从直觉过渡到分析,却不能由分析产生直觉。”(《形而上学导论》,伦敦,1913 年,第 59,41 页。)西方的东方体系评论家们常常自我满足于自己作的分析,但是仅仅具有分析的技巧,并不必然就具备能够产生直觉或智识同情的那种综合性的天赋。

第二章

十四个儒学文本

在荷属爪哇岛上,生活着许多由中国而来的生气勃勃的定居者,他们是来自于中国南部省份的移民及其后裔。大约在1908年,这些中国移民中的主要成员们已经开始认真地关注其子女的教育问题。他们担心由于身处异国他乡,自己的子女正面临丧失与其祖居地文化传统的联系的危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他们成立了“儒学学会”,这一组织的主要目的就是督导其子女们的教育。这个学会很快变得富有活力且很有影响。早在1909年初,该学会就向中国派出了一个代表团,由当地华人商会的会长领衔,目的是要向当时中国学界的领袖人物咨询,如何找到一条最行之有效的路子来教育他们的子女。他们所咨询的这位人物,不仅是一位处于上升阶段、具有完美声望的政府官员,也是一位诗人、艺术家、宪政改革的倡导者,同时还是帝国中最有威望的儒学家。他的名字叫郑孝胥,现任“满洲国”总理。由于近来政治事态的发展,研究远东政治的学生们对这个名字已经很熟悉了。^①

① 关于对郑孝胥(在中国的文化圈里以苏龛名)(郑孝胥,字苏龛。——译者注)经历和性格的描述,请诸君看我在1932年6月份的《英格兰评论》(*English Review*)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第643~651页。关于“满洲国”建立以前及其后郑孝胥与朝廷的关系,我在《紫禁城的黄昏》(高兰兹,1934)一书中已有描述。

从这位既干练又有造诣的福建人那里,他们得到的不仅仅是鼓励和中肯的建议。郑孝胥还给他们编写了一本有关儒家伦理学说摘要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既包括他汇编的儒家经典,也包括他自己的评论。这本小册子的名字是《孔教新编》,或可译作“儒学新手册”。该书的内容摘自儒家著作,包含十四个经典片段或文句,每个后面都附有简短的评论及解释,其目的主要是为学校的教师作参考。除一篇外,其余都取自于我们所熟知的儒家学说的经典著作《论语》——英文通常译为“孔子的论说”,即“孔子的教言”。出自《论语》以外的那一篇——位列所有的篇章之首——摘自《孝经》,或可译作“古典孝道”。

如果排列在一起,这十四个经过精心选择的片段或文句占据的篇幅还不到两三页四开纸张的版面。我想提供给你们的是我自己对这些文本的翻译,附带一些解释性的评论,其中的一部分是以郑孝胥自己的评论为基础的。

这十四个文本不能被看作儒家信条的对等物,或是儒家思想的充分展现,尽管这样的提醒或许显得有些多余。这本书没有选入的儒家经典的一些内容,一个通晓儒学知识的欧洲人可能会编入,但这本书却编入了欧洲人认为不那么重要的一些文本。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说这本容量不大的选辑却尽可能地涵盖了合理审慎的儒家教义,人们认为它适用于时下道德教育和学校教育的需要。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些文本是由一位非常称职的中国权威人士挑选出来的,旨在为中国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所受的教育既严格遵守儒家的规范,同时又能满足他们生存于现代环境的需要)提供适宜的精神营养。因此,无论你怎么看待这本选辑,你至少应当相信它是纯粹的儒家学说,没有掺进任何杂质性内容,因为这本选辑是由一位把对儒学的忠诚和现代视角结合起来的学者所阐释的。这位学者尽力避免过于尊崇过去而忽视当今一代人的现实需求,而这一代人,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地